

# 論美國聲望的下跌及其重振問題

譚溯澄

美國是一個歷史較短的國家，它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擁有雄厚的工業生產力，強大的三軍戰略裝備，再加上民主與自由的新思想號召，遂成爲當時自由世界的領袖。所謂「美國式的和平」(Pax Americana)就擴及到全世界，而美國自身也扮演著「世界警察」之角色。但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美國國內問題叢生。自尼克森總統於一九六九年七月發表關島聲明(Guan Statement)以後，美國國勢就有明顯的退縮。一九七〇年代，國際間盡是「和解」的說辭，結果在這十年間，北越戰勝了南越，華盛頓背棄了臺北，親美的巴勒維國王流亡，印度在蘇俄的支持下也「肢解」了巴基斯坦。直到最近蘇俄出兵阿富汗，才使若干美國領袖猛醒。卡特說他要效法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推行「大棒子政策」(big stick policy)；不過，只靠大棒子，就能應付得了蘇俄的囂張嗎？這就是本文所要分析的。

## 一、美國聲望下跌的原因

研究世界政治的許多學者們，從人類過去的經驗中，體認到一個原理，即：無論一個國家的國力是如何地強大，它終必有一天會走向衰落的途徑。其原因雖隨國家而不同，但在大多數的事例中，總有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形成該國由巔峰而步入衰落的水嶺。美國在一九六〇年代從事越戰的失敗，即可作爲這種例證的代表。當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特別是自詹森擔任美國總統後，越南戰爭急劇升高，最後有五十餘萬之美軍，都被牽制在越南，而無法用於他處。美國付出了一千億美金的代價，結果還是不免失敗。假使詹森能夠改變一下戰略，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就動用美國海空軍，嚴密封鎖北越的海防和其他港口，則越戰當不會如後來之無法收場。美國的高級策劃人士，普遍低估了北越軍隊頑強作戰之能力，又太過於自信「戰略轟炸」所能帶給北越的摧毀性效果<sup>①</sup>。沒有想到北越不惜任何犧牲，依然向美軍大舉進攻。縱使巴黎協定簽訂了，其實也等於一張廢紙。越戰是美國立國以

註① 鈕先鍾譯(Maxwell D. Taylor 原著)，劍與犁：〔泰勒將軍回憶錄〕(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出版)，二七〇頁。泰

勒將軍明白承認「北越的頑強程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而照西方標準來計算，其所付出的代價早已得不償失」。

來對外參加戰爭之首次大敗筆，對於美國的國際聲望打擊，是不言可喻的。這是導致美國聲望下跌之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美國過去在非共世界的一般人心目中，原被視為西方民主文化高度發展成熟的象徵，爲人類自由、平等、幸福所追求的理想典範，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學說成爲許多落後國家對抗專制與獨裁的利器。但是美國主動和中共打交道的結果，使得東亞地區的很多高級知識份子對於美國大爲失望。卡特最近在蘇俄出兵阿富汗後，曾謂克里姆林宮欺騙了他，但是卡特也應該問問自己，你是否也曾「欺騙」過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人民？美國一方面高唱「人權外交」，却又在同時與世界上殺人最多的政權相交，這怎麼能够自圓其說？白宮所做的種種矛盾行爲，已無法讓人們覺得美利堅合衆國還是一個可資信賴的國家，這當然要導致美國國際聲望之下降了<sup>②</sup>。

在美國國內方面，尼克森「水門事件」的醜聞，使得美國的老百姓對行政當局失掉信心，不願意再接受總統的領導。由此而影響到美國總統對外國履行承諾的權力。譬如當尼克森在位時，本會向南越的阮文紹政府保證，當北越南侵違反巴黎協定時，白宮定予河內以「切實有效的報復」，不幸美國政府並沒有履行這項承諾；結果當北越明目張膽撕毀巴黎協定之際，除了美國數度提出抗議外，根本沒有給予南越有效的支援。此外，美國經濟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迄今，已經有十餘年都無大幅好轉跡象，展未來仍舊是十分艱辛。這也使得外國對美國的「巨無霸」映象漸趨改觀，當然也就較前不看重美國了<sup>③</sup>。

從莫斯科的眼光來看華盛頓，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當時美國的核子戰略武力，是蓋世無雙的，所以在古巴危機期間，美國總統甘迺迪可以利用優勢的軍備力量，強迫赫魯雪夫從加勒比海撤退。但是現在呢？蘇俄不僅在戰略三元（陸上洲際飛彈、潛艇彈道飛彈與戰略轟炸機）之總和上，要比美國超出很多<sup>④</sup>，就是在「質」的改良上，也要比美國來得迅速。於是美國就不能利用「戰爭邊緣」之策略，強使克里姆林宮退縮。容我們坦率以言，克里姆林宮的首腦們，的確是認爲整個世界的戰略平衡，正日趨於對蘇俄有利<sup>⑤</sup>。莫斯科敢於悍然出兵阿富汗，它老早就知道卡特光會說大話，這是沒有用的。「嚇阻戰略」的運用必須立於「可信性」(credibility)的基礎上，如果敵人知道你根本不可能有大作爲，那你的「嚇阻戰略」就無效了。卡特目前所面臨的，就是類似於這樣的一個情勢。

註② 這不只是美國的友邦人士有此感覺，即如美國參議員高華德，亦會明言美國政府欺騙了他們。

註③ David H. Blake and Robert S. Walter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6), pp. 15

—19—

註④ 當一九七九年六月，美蘇限武談判第二階段雙方達成協議時，美國之戰略武器總額爲二千二百八十三件，蘇俄之總額爲二千五百零四件。

註⑤ William B. Husband, "Soviet Perception of U. S' Position-of-Strength Diplomacy in the 1970s," *World Politics*, Vol. XXXI, No. 4, July 1979, pp. 495—517; R. Judson Mitchell, "A New Brezhnev Doctrine: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XXX, No. 3, April 1978, pp. 366—390

## 二、「和解」政策之根本缺陷

「和解」政策之高唱入雲，係在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以及季辛吉出任美國國務卿之後。季辛吉在演說時，經常為「和解」政策而辯護；他的最大理由是說，美國與蘇俄進行「和解」，主要目的在防止世界核子大戰的爆發，以期避免人類陷於另一場大浩劫<sup>⑥</sup>。不過，問題乃是，美國必須要確實能使「和解」成為互利的，而不能在「和解」的煙幕下，乘機混水摸魚。

吾人當還記得，在南越被北越赤化後，福特總統曾經說：「我必須堅決誓言，任何美國的對手或潛在的敵人，都不能認為美國可以被任意挑戰的；任何盟國或經過時間考驗過的友邦，都不應憂慮或恐懼美國由於最近的東南亞混亂演變局勢，而不遵守我們對他們的承諾<sup>⑦</sup>」。結果呢？中華民國算不算美國的盟國呢？中華民國難道不合於「經過時間考驗過的（美國）友邦」嗎？到頭來，美國不僅不承認中華民國為「合法的政府」，而且還用並非光明磊落的手段，將中美協防條約廢除了。今天當阿富汗已被蘇俄軍隊武裝佔領後，卡特又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大聲叫道：「美國不會向恐怖主義或國際威脅屈服，無論它出之以什麼形式或在任何地方發生。」倘使美國還是和以前一樣，口頭上說得咬牙切齒，行動上却仍然無一戰的決心，則恐怕在不久的將來，還要產生第二個、甚至第三個變相的「阿富汗事件」。

「和解」政策原是季辛吉玩弄權力平衡下的產物。而權力平衡要能在相當期間內維持穩定，必須先要有一個基本的條件，即在該一國際政治體系中的主要運作單元（main operational units），都大致上係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如果不然，則現有的國際政治體系必趨於肢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皇威廉第二（William II）捨棄俾斯麥的策略而改採所謂「世界政策」（die Welt-politik），以及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執政後要打破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均是顯明的例子<sup>⑧</sup>。但是在目前的東亞權力平衡結構中，是否主要的國家和政權都有採取「維持現狀」之政策的傾向呢？依高立夫（Ralph N. Clough）的看法：東亞四強之間有思想與理論方面的敵對，這是以前很多均勢體系所沒有的。思想與理論不僅阻礙共產國家與非共產國家間的親密與友好關係，而且易於加深這兩個共產國家（中共與蘇俄）的不和。中國大陸過去從未參與均勢體系。自一九七一年以來，中共設法與美、日改善關係，以加強其對付蘇俄之地位，這亦可以說是正在試用均勢政治。不過，這種行為，似乎出於短期的戰術考慮，而非中共

註<sup>⑥</sup> "Secretary Kissinger Sees Detente As Only Possible Policy," *U. S. Foreign Policy News Backgrounder*, U. S. Information Service (Taipei,) Jan. 27, 1975.

註<sup>⑦</sup> "Ford's Words—to Friend and Foe,"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4, 1975.

註<sup>⑧</sup> Carlton J. H. Hayes, *Contemporary Europe Since 1870*, Revised Edition, pp. 145, 610 and 625; (臺灣翻版):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372—401.

希望四強權力在東亞獲得長期的均衡<sup>⑨</sup>。

這至少是說明了中共並無意長期想維持均勢。自從過去美國企圖拉攏北平以對付莫斯科以來，克里姆林宮不但和越南組成了聯盟關係，它還鼓勵越南去攻打高棉，而今又赤裸裸地以紅軍霸佔阿富汗，這又顯示了蘇俄亦無維持均勢的打算。處於這種狀況下，美國若和根本無意維持長期權力均衡的兩個共產國家，要談什麼「和解」，要塑造什麼「長久的和平」，這不是等於緣木而求魚嗎？鄧小平說：「我們（中共）是馬克斯主義者，絕不會傻到敵我不分的地步，尼克森、福特、卡特和美帝將來的領導人，都跳不出同樣的圈子，他們要利用「中」（共）蘇兩黨的分裂，來搞垮世界社會主義制度，來牽制蘇聯對他們（美國）的威脅，我們又爲什麼不可以利用他們（美國與蘇聯）之間的矛盾和間隙，而採取對我們（中共）有利的政策呢？」<sup>⑩</sup>北平的政治決策者之態度既然如此，可以想到，美國之單相思地追求「和解」，就難免要吃虧了。

所有的共產黨人都知道，假使戰爭就是政治的延長，只不過是用另外的一種手段而已；那麼和平也就是鬭爭的延長，也不過是利用另外的一種手段而已<sup>⑪</sup>。西方國家的觀念，常認爲和平是和平，戰爭是戰爭，兩者不能混爲一談的。但是在共產黨的辯證觀念中，却認爲和平裏面就含有戰爭，故「和解」也是戰爭的另外一種形式。在克里姆林宮看來，美國之採取「和解」政策，正是表示在「實力的相互關係」上（correlation of forces），已經日趨對於莫斯科有利；只此一點，就可以證明克里姆林宮之進行「和解」乃是「別有用心」的。

### 三、卡特宣示「巨棒政策」的含義

俄軍入侵阿富汗，既被卡特總統認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和平最大威脅」，於是他想以老羅斯福總統的「巨棒政策」，來用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上，以抵擋莫斯科的對外擴張<sup>⑫</sup>。因之，未來國防軍費的增加，則是必然的；依照目前美國政府的計劃，預備於一九八一至八五年內，消耗一萬四百億的美元於國防建設上，其中增加幅度最大的，爲發展MX機動型飛彈之費用。此項費用在一九八一年度預算內，將由原計的八億美元，增加到現在編列的十六億美元，其增加幅度爲百分之百<sup>⑬</sup>。除了增加

註⑨ Ralph N. Clough, *East Asia and U. S.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5.) pp. 45-46.

註⑩ 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摘要），「匪情月報」，二十卷十二期，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八九頁。

註⑪ 參見郭湘章、王漢中、李約合譯，「近代各國戰略論」（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再版），第二冊，第十四章「列寧、托洛斯基史達林：蘇維埃的戰爭觀念」，二二六至三〇三頁。

註⑫ 「美國改變外交政策，要用實力維護和平」，「聯合報」，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一版。

註⑬ 「美決增強國防：今後五年軍費總額，將達一兆美元以上」，「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二版。

國防預算外，卡特還有意推行下列諸構想：

- (一) 在未來五年內，增加美國戰術空軍一千五百架之新飛機，即平均每年增加三百架。
- (二) 在未來十年內，將海軍力量增加至擁有五百五十個單位，包括加速建造三叉戟型飛彈潛艇在內。
- (三) 組織一支特別的干預部隊，可以在獲得通知後，迅速派遣最多可達十萬人，至世界各地。
- (四) 提前核子武器現代化的進度，預備儘可能從一九八一年開始，即行生產巡航飛彈。
- (五) 為恢復徵兵制度做好一切準備，以便一旦需要利用徵兵動員時，能夠迅速加以動員。
- (六) 結束對中共與蘇俄兩者的「對等政策」，而增加對北平之出售軍事裝備和科學技術。

縱使美國自一九八一年度開始增加國防預算，也得要再過若干年後才能充分看到效果。多年以來，蘇俄在國防建設上所投下的金錢，遠比美國為多。以一九七七年為例，據美國裁軍總署之估計，蘇俄約比美國超過四百億美元。卡特現在所設計的一九八一年度國家預算中準備動用的一千四百二十七億美元，大約和過去數年蘇俄之國防經費的平均數相等<sup>⑭</sup>。

為了作較深一層的瞭解，吾人似應於此對老羅斯福總統的「巨棒政策」之實際推行情形，略加敘述。認真地說來，「巨棒政策」不只是老羅斯福所推行的政策，在他以前的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以及在他以後的塔虎脫總統(William Howard Taft)和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也都與該種政策有關。因之，大致可以把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七年間的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作為「巨棒政策」的典型<sup>⑮</sup>。它曾干涉過古巴、海地、巴拿馬、聖托多明哥(Santo Domingo)以及尼加拉瓜等處的問題。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中，「巨棒政策」乃是被視為代表一種「帝國主義」的作風的。更由於老羅斯福總統在歷史上，向來是以「粗暴」見稱，故益難免使人懷疑卡特總統在未來是否也和老羅斯福一樣，欲想將美國的意志加強於其他「弱小國家」的頭上呢？

依筆者的看法，美國實不應以「巨棒政策」來作為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號召，主要的，「巨棒政策」乃是一個惡名遠溢的名詞，使許多「弱小的國家」聽到就會頓起疑心。譬如當卡特提出老羅斯福的「巨棒政策」後，在波斯灣的小國科威特即批評卡特說，美國的做法係干預了波斯灣國家的內政。照理說，科威特屬於「溫和派」之阿拉伯國家，應該同情美國的立場才對，但為什麼還要抨擊美國呢？這主要就是當以前美國總統推行「巨棒政策」時，曾把古巴(一八九八)、海地(一九一五)、多米尼加共

註⑭ 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美國的軍事支出即約七百八十億美元，至同年代中期(一九七五年)，已達九百一十億美元，迨末期則超過一千億美元。但這個增加速度，還是不如蘇俄。在一九七五年以前十年之情況，請參見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66—1975* (Publication 90, December 1976)。

註⑮ Wayne S. Cole,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Homewood, Illinois: Dorsey Press, 1968,) p. 312。

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尼加拉瓜 (一九一三)、巴拿馬 (一九〇三) 等收為美國的保護國 (U. S. Protectorate) ⑮。在今天現實的國際環境裏，還能把這種做法用於波斯灣諸國嗎？

所以筆者認為，「巨棒政策」主要是以美國自身為強國，而來對付拉丁美洲諸「弱國」的辦法，而不是以強國美國來對付另一強國如蘇聯的辦法。在相互比較之下，英國的外交首腦所說的話，就比較合理了。英國外交部政務次長赫爾德在 一月二十日謂：「如果波斯灣國家提出要求，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將提供援助，以保衛該地區的安全。」這話在基本上，是承認了對方國家（即受援國）之國際平等權的。

當卡特一方面說「我們（美國）已重申一九五九年對巴基斯坦的承諾」，以及「包括使用軍力在內，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保護巴基斯坦的安全」；但在另一方面，却又避免和巴基斯坦締結盟約，儘管巴基斯坦希望和美國這樣做 ⑯。這就顯得美國對蘇俄還是有所畏懼的。照筆者的看法，美國在巴基斯坦的主動要求下，應該和巴國結盟，這是提高美國在國際間聲望之一個基本的做法。以下還要對與此有關的問題，作較詳細的說明。

#### 四、美國重振威望的途徑

美國政府的領袖們，若想成功地重振威望，首先必須在心態上加以改變。吾人應知，權力平衡已是一套陳舊的維持國際和平的觀念。坦白地說來，權力之「平衡」與「不平衡」是根本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衡量的。所以弄到現在，在實際從事政治的人之口頭禪中，都以「權力平衡」一辭，來替他的政策作辯護。其實，大部份的政客所說的話，都沒有學術上之「認知意義」 (cognitive meaning)。譬如當南越被北越赤化，有人說北越的共黨政府，「破壞」了東南亞的國際權力平衡結構。現在當阿富汗被紅軍佔領了，有人又謂此乃克里姆林宮破壞南亞與中東國際權力平衡的重要計謀。可是縱然是北越與蘇俄都做了「破壞」的行爲，也未見白宮想出什麼好方法，叫這種已「破壞」的情勢恢復「原狀」。於是天天講「權力平衡」，其實多係白費口舌，它的目的不在於解決問題，而在於使自己的行爲（即使是錯誤的），可以找到一個安全的「理由化」 (rationalization) 避風港 ⑰。

⑮ Wayne S. Cole, *op. cit.*, p. 314; Thomas A.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5, pp. 548-562.

⑯ 王洪鈞譯 (Ray S. Cline原著)，一九七七年《世界國力評估：列強策略遊動演算書》（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五版），二七六頁以下。

⑰ 對於「權力平衡」觀念的批評，參見張保民譯 (Inis L. Claude, Jr. 原著)，《權力與國際關係》（臺北：幼獅文化專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出版），七至七十頁。

有人要問，果真捨棄「權力平衡」不談，那它的替代品是什麼呢？照作者的淺見，除了恢復大聯盟制度（Grand Alliance System）以外，似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大聯盟的方式可有多種，如先以若干區域性的聯防組織為基礎，然後由美國從中協調，此是一種；另外像克萊恩博士（Ray S. Cline）所計劃的「海洋聯盟」（Oceans Alliance），在基本上，也是屬於「大聯盟」的形式。我們可以看清一個事實，從二次世界大戰後，非共世界中的國家有若干已經變成為共產國家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已經「共產化」的國家，是曾經脫離了馬克斯意識型態範圍的。固然中共與蘇俄之間存在着長期的分裂和叫罵，但是不論北平或莫斯科，又有誰敢公開承認它不是馬克斯、列寧的嫡系正統呢？無論任何一種非共國家的大聯盟，其主要目的是要在消極方面確保任何一個非共國家不致於進一步地變成為共產國家，而在積極方面則使已經「共產化」的國家，有在將來脫離馬克斯意識型態的可能。

就具體的措施言，在東亞方面，美國可以進一步地支持南韓國內政局的穩定，協助韓國加速軍事方面的現代化，尤其應該鼓勵日本、韓國與中華民國間的三邊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韓國、中華民國三國的經濟發展依然和前十年一樣，會有比他一般國家較高幅度的成長。這是非共世界之非白人國家中，相當重要的一份資產。如果美國在短期間內，不能馬上停止與北平的聯繫，那至少也應該以「對等」的態度來同時應付中共和莫斯科。假定美國因為阿富汗事件之發生而竟然基於「報復」的考慮，而加速與北平的結合，這只能鑄成大錯，是無補於時艱的。一旦在若干年後，兩個共產「巨強」同時壯大，美國又怎麼能以它的漸弱力量來抗拒呢？北平的最後目的是非常單純的，即以「美國的科技」來消滅「科技的美國」！

在歐洲方面，盟國所遭遇的難題，在軍事問題與心理問題上的嚴重性，要遠過於經濟問題。這是因為自從北海之石油大量開發後，德國、英國、荷蘭諸國的能源問題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迫切了。可是在軍備上，却因華沙公約國長期不斷增強武器威力的結果，竟使西歐的一般人民愈來愈恐懼戰爭。蘇俄對西歐的長程外交政策，就是導致該地區的整個「芬蘭化」（Finlandisation）<sup>19</sup>。俄共理論家波諾馬瑞夫（Boris Ponomarev）就曾說過：「和解的條件及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為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義大利和法國的左派勢力，提供了特別的機會。此時，我們認為共黨較過去有更多的機會與資源，來影響歐洲的事件過程<sup>20</sup>。」處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可以積極鼓勵西歐的統一運動；一旦西歐在政治上能够更趨於統合（integration），則相對地，它對抗華沙公約集團的力量也就愈大。

<sup>19</sup> James E. Dougherty, "The Soviet Strategy of Finland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The External Process," in Walter F. Hahn and Robert L. Pfaltzgraf, Jr. (ed.), *Atlantic Community in Crisis: A Redefinition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p. 193—242

<sup>20</sup> Pravda, October 18, 1974, 引自趙春山，「芬蘭化：蘇聯對西歐的戰略設計」，〔東亞季刊〕，十卷四期，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七十二頁。

在中東方面，能夠有助於抵制馬克斯意識型態的最大力量，厥為伊斯蘭教之普遍信仰。尤其難能可貴者，是它的精神領袖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是當今全世界國家中，最講「原則」的極少數國家之一（沙國是決定退出奧運以打擊莫斯科的第一個國家）。美國宜乘阿富汗事件之影響，鼓勵「伊斯蘭教外長會議」再作較密切的接合，甚至成立一種類似「泛美公約」的「泛伊斯蘭教組織」。這不但有益於南亞局勢的穩定，而且也使印度洋的北緣大部份國家增加相當的安全感<sup>②</sup>。

## 五、結 論

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武力，如果要能對外交政策作「真正」有效的支持，則該國決策者必須有在最後使用武力的決心。以阿富汗和伊朗最近之事件為例，非常明顯，蘇聯有決心在阿富汗使用武力，而美國却沒有決心在伊朗行使武力。美國縱使有再多的航空母艦部署在印度洋，如果對方在心底裏就「知道」白宮根本無「動武」的決心，那是無法達成「有效」支持外交政策的目的。筆者認為，美國若想重振其國際聲望，首先就不要在嘴巴上大叫，必須有決心打一場戰爭才行（不管此種戰爭是代理性的、有限性的、顛覆性的或戰術性核子性的）。

如果美國支持巴基斯坦，諸伊斯蘭教國家也支持阿富汗內的宗教性反共團體，則克里姆林宮也會訓練阿富汗境內的親俄份子，向巴國以及其他回教國家展開滲透。特別是伊朗與巴基斯坦邊境附近的「分離主義者」（即要求脫離該兩國之管轄而獨立），更成為蘇俄所可以利用的對象，這是美國應該詳細策劃而想法抵制的。

白宮的決策者，處在當今的國際政治權力結構下，固然不宜過度強調意識型態，因為這樣做，必然會使美國增加處理國際問題的困擾；但是相反地，美國的總統也不宜忽略意識型態在現實上的重要性，尤其不能故意貶低意識型態在政治運作中的價值。可惜自尼克森強調「和解」政策以來，大家都把意識型態的重要性遺忘了，這對非共國家而言，是相當危險的。

註<sup>②</sup> 關於「泛美公約」，參見 A. LeRoy Bennet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Issu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7), pp. 295—301.